

关心中国金融，就是关心自己的未来！

FINANCE 再造金融

中国金融改革新趋势

REFORM FINANCE

■ 李文星 主编

■ 利率市场化：宜快宜慢？ ■ 人民币会不会贬值？ ■ 巨额外汇储备是否福海无边？ ■ 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多远？ ■ 北方金融中心：京津联合体 ■ 中国金融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 ■ 货币政策应吃中药 ■ 狙击国际金融黑客 ■ 谁是中国新金融的缔造者？

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财B0086875

再造金融

——中国金融改革新趋势

11327/67

顾问：杨继瑞

主编：李文星

编委：李文星 范逢春

陈晓东 黄昌胤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登录号 455425

分类号 F822.1/23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 方康勋 王 例

封面设计 张克林

再造金融

李文星 主编

*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磨子桥 邮编 610065)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875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字数：300 千字

ISBN 7-5616-3652-0/F·365

定价：22.80 元

序 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满盘皆活。我国近 20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金融业的发展亦为经济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国际上频繁发生的金融风波并不会让中国因噎废食，减缓金融改革的步伐。按规划，“九五”期间，我国将建立起金融的调控、组织、市场、监管和服务五大体系，初步形成统一规范的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各类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从我国经济 1996 年实现“软着陆”的情况看，以金融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经济在 21 世纪能否有一个好的前景，关键在于中国金融能否有一个明朗的天空，在于中国金融能否为中国经济提供稳健而持续的动力。

现实的状况令我们在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亦有几丝深深的忧虑。人民币会不会贬值，我国金融市场是否充分，货币政策是否完备，利率水平是否合理，金融监管是否有效，银行和国企能否找到活路等等这些问题，成了悬在中国金融头上的几把利剑。这几利剑能否为世纪之交的中国金融劈出一条路来，由李文星、黄昌胤等编著的《再造金融——中国金融改革新趋势》一书正回答

了这个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此书观点鲜明，材料翔实，论证充分，能够把深奥晦涩的金融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适合于关心中国金融走势的一般群众、金融工作者和大中专院校的师生阅读，特此推荐。

是为序。

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
四川联合大学副校长

杨继瑞

1998年4月22日

目 录

序言	杨继瑞 (1)
第一章 谁来再造中国金融	(1)
●天降大任：新一届政府亮相	(1)
●中国金融高悬达摩克利斯剑	(3)
●再造中国金融思路何在	(10)
●中国金融：路途漫漫其修远兮	(20)
第二章 人民币会不会贬值	(62)
●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诸因素	(63)
△国际收支是汇率变动的主导因素	(65)
△利率调整引起人民币汇率短期变动	(72)
△通货膨胀率：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基础	(76)
△外汇市场投机力量推波助澜	(80)
●强势人民币何去何从	(84)
△国家领导人：人民币不会贬值	(86)
△人民币战略贬值必候佳机	(88)

●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90)
●人民币自由兑换，还能走多远	(93)
第三章 金融市场完备吗	(101)
●证券市场：反常的经济“晴雨表”	(106)
△中国证券市场现状：想说爱你不容易	(106)
△中国证券市场违规操作现象：玩的就是心跳	(110)
△中国股市：亟须规范化	(114)
△世纪末的中国股票市场：是牛是熊	(132)
△历史机遇：利用牛市推进改革	(137)
●债券市场：你让我如何是好	(151)
△国债市场：乱云飞渡仍从容	(151)
△企业债券市场：你明天将要去何处	(157)
●资本市场：现状及走势的基本判断	(162)
第四章 再造金融的启动器：利率调整	(173)
●利率：一降再降为哪般	(173)
△利率：与国企相联	(185)
△利率市场化：宜快还是宜慢	(187)
△利率下调：新一轮经济启动的信号	(198)
第五章 再造金融的保险阀：金融监管	(202)
●前提：无孔不入的金融风险	(203)
●道路：中国金融监管何去何从	(205)
△中国金融监管大思路	(206)
△金融监管道具：宏观调控	(212)

△金融监管的四大手段	(223)
●策略：大中国的区域金融监管	(234)
●方式：传统与现代的大置换	(250)
●前途：挡不住的国际化趋势	(254)

第六章：再造金融的胜负手：银企协调改革	(263)
●忧患、忧患：债务与债权	(264)
●化解不良资产的三大魔方	(280)
●征途漫漫话银行	(308)
△央行：办好份内事	(308)
△商业银行：真正商业起来	(311)
△政策性银行：名要符实	(321)
●大决战：重塑银企关系	(328)
△症结：解除银企不正当关系	(329)
△误区：主办银行制度不是救命稻草	(340)
△思路：内部化与外部化	(347)
△钥匙：松散型与紧密型	(357)

第七章 再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376)
●国际金融中心有一定的程式	(377)
●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多远	(379)
△上海：莫失良机	(380)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临巨大挑战	(386)
△上海：如何定位自己	(391)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思路	(395)
●北方金融中心：京津联合体	(399)

●南方金融中心：非广州莫属	(404)
●中西部金融中心花落谁家	(405)
△成都：有待一搏	(406)
△武汉：能否梦圆	(412)
后 记	(414)

第一章 谁来再造中国金融

众所周知，在改革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金融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金融作为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领域，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实质性开放阶段。其重要标志，一是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一是人民币实现可兑换，被看作中国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两大“手笔”。

中国市场经济“软着陆”的成功，金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软着陆”只表明总量供求的平衡。金融面对的更重要课题是，如何使步入快车道的经济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活力。

●天降大任：新一届政府亮相

谁来再造中国金融？

举世瞩目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了实

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李鹏出任人大委员长，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李瑞环出任全国政协主席，胡锦涛出任国家副主席，这个领导班子被外电评为举世欢迎的“梦幻组合”。

江泽民当选连任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体现了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卓越政绩和雄才大略的充分肯定和拥戴。江泽民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9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外交十分活跃，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继续保持这样良好的发展势头，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江泽民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继续担当起领导中国迈向21世纪的历史使命，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李鹏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同样体现了人民对他政绩和工作能力的肯定。李鹏主持政府工作11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体制改革迈出决定性步伐，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与国际的合作和交流也日益增强。

以擅长经济管理和作风务实著称的新总理朱镕基是处理诸多经济难题的行家里手，特别是1993年以来，他在江泽民、李鹏的支持下，果断决策，加强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中国经济不仅出现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罕见的好形势，而且还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成为稳定区内金融与经济局势的重要支柱。带着举世瞩目的政绩荣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人们相信今后他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将会有更大作为。

55岁的胡锦涛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体现了国家机构领导班

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这样一个坚强的务实的精通业务的领导班子能够确保中国经济宏观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些对中国经济金融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其实是没有太多理由的，因为我们有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了善于解决经济难题的朱镕基总理和他的政府同事。

他们是中国金融的再造者！

再造金融，重组国企，改革政府，是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实现再造中国宏伟目标的三大规划，也是关系着中国前途命运的三大改革，被世人称为“三大战役”。

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摧毁了一个旧世界。

江泽民指挥的“三大战役”必将诞生一个新世界！

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被现当代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践所证明了的。因此，对于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中国来说，再造中国新金融便成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和首要途径。

20世纪的中国可以分为大略两个阶段：孙中山和毛泽东缔造了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邓小平和江泽民则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中华史册将在21世纪记载他们的丰功伟绩。

再造金融，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

●中国金融高悬达摩克利斯剑

再造中国金融，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伟大目标和艰巨任

务。目标的宏伟激励着我们努力奋斗，任务的艰巨则昭示我们必须冷静、深思和坚毅。

专家学者型并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和现代意识的中国领导人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是我们信心的源泉。

尚显幼稚的中国金融；能否健康成长前途平安？

自 1979 年第一家外国银行代表处在北京设立以来，外资金金融机构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业务规模上，都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1997 年上半年，在华外资金金融机构代表处 530 多家，其中，外资银行分行 130 多家，来自英、法、美、日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已批准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金融机构的经济特区和城市已有 26 个。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外汇总资产的比例已达 14% 以上。

1996 年 12 月中央银行正式批准美国花旗银行等四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外国金融家在中国金融舞台正式“粉墨登场”。在此之前还只是试了试台步。1997 年，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扩展到 9 家，其中通过有关检验于 1997 年 3 月正式营业的 6 家外资银行，到 1997 年 7 月人民币存款逾 2 亿，贷款逾 1 亿。

80 年代引进外资银行初期，对引进外资银行的政策原则是“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以保护极不发达的国内金融业。90 年代后对外资银行的政策转变为“放宽业务”吸引其积极进入、“严格监管”制约其不利影响。

虽然目前对外资银行进中国市场在审批过程中仍采取谨慎和有步骤开放的方式，但允许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并促进其业务全面发展，是中国活跃国内金融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五”期间，中国将吸收外资2300亿～2700亿美元，外资银行将扮演国内银行无可替代的角色。

如果说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关键步骤，人民币实现可兑换则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里程碑。

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的外贸、商业及各种服务行业对外资一直受严格限制，除了基于保护国内企业利益的理由外，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兑汇的技术性问题对正常的经营运作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长期备受外汇匮乏之苦，为增加外汇收入几乎不惜代价。多少年节衣缩食，到80年代中期，外汇储备不足20亿美元！对外贸易中一度衍生出了“易货”、“三角贸易”等五花八门的形式，也带起了黑市换汇的全盛时期。90年代后人民币可兑换步伐大大加快。并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第八条款义务，从而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比原先承诺的在本世纪末实现这一目标，提前整整四年。

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实质或核心，在于取消了贸易上的外汇限制，以利于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有能力实行健全的经济政策和参与国际自由贸易的意愿和能力，而不需要依赖于对国际经常项目交易采取外汇限制，客观上有利于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提供新的契机，可以看作这是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主流的一个序曲。

金融业在中国尚属幼稚产业，应由政府予以保护。开放是否意味着丧失保护？面对逐渐扩大开放，中国金融界存有深刻的担心。

问题在于，不管愿意与否，金融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从国内市场看，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有力地带动外资流入中国。1993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接受国。但总体上外资在中国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还小，外资未参与的领域还很多。1997年4月，中国宣布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将向世界提供7000亿美元的市场，表明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还很大。

从国际市场看，近几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纷纷推出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的计划，以使本国、本地区金融与世界金融环境相适应。世界银行1997年5月份发表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是否准备好，发展中国家都将被卷入正在形成的统一的全球金融市场……

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九五”初，工商、农业、中国、建设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至少占全国银行业的80%，从业人员约180多万，队伍之庞大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1994年开始的商业化改革，随着国家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国有专业银行新的运作模式基本形成。1996年《商业银行法》颁布，国有银行的自主地位便缓慢地改进起来。1997年取消信贷规模限制，为专业银行商业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专业银行商业化，实质上是国有金融组织由计划经济的杠杆向市场经济杠杆的职能转换，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典型的商业银行同传统的专业银行相比，最大特点在于：把金融服务和信贷资金当作商品经营，利润是其经营主要目标，全新的内部管理制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

然而，从实践看，国有银行商业进程障碍重重，步履缓慢。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其功能就能充分发挥，更不意味着困扰中国金融界多年的政策性融资问题的解决。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后，政策性业务藕断丝连，自主经营力不从心。一方面，过去专业银行背下的沉重历史包袱难以下卸，另一方面，资金供给制的惯性仍在起作用。银行似乎一直挨“挤”，只是方式不同而已。银行作为“第二财政”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于一些地区。

国有银行商业化难以逾越的障碍，来自国有企业。

“财政是娘，银行是爹”，这是以往对国有企业依赖性的写照。经济改革至80年代中期，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统营，财政不再供应，被娇宠惯了的国有企业一下子失去了“母爱”，从此便百般依赖上“父爱”，银行的“统管”很快变成了“统包”：投资靠银行贷款，生产、经营靠银行贷款，还贷靠银行举债，疲软的国有企业完全躺在了银行身上，基本上是靠银行“输液”维持。银行一“感冒”，企业就“发烧”。最终无可挽救的，还得靠银行去“保安定团结”……

向银行伸手要资金对于许多企业是天经地义：“国家的企业不向国家银行要钱，向谁要？！”这一观念流行之后，企业投资需求便膨胀了起来，“敢借、敢花、敢不还”，天塌下来砸银行。

银行的不良资产时时都在增加。到1996年，仅国有企业贷款呆、坏帐就有1万多亿元，相当于银行自有资产的近三倍。国有银行的资金的70%贷给了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大部分风险都转移给了银行。不仅贷款本金沉淀、呆滞、呆帐居高不下，而且企业欠息与日俱增。据保守估计，银行应收贷款利息余额超过1000亿元。

企业赖帐不还，有些商业银行无可奈何之下便拉着企业上法庭。当然银行有理。然而，官司赢了依然收不回贷款。更有甚者，借转换机制之名逃避银行债务“蔚然成风”。国家于1997年初已确定全国58个城市进行破产试点。然而，不少地区却出现企业“争相破产”现象。东北某省在国家公布破产试点前的半年里，就有200多户企业宣布破产，超过了前十年破产企业的总和。“破产”招式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或者先破产后兼并，或者先分立后破产，以实现“大船搁浅，舢舨逃生”。国家确定的破产试验城市之一的武汉，1991～1996年共有近60家企业宣告破产。其中已经法院审理终结的50多户，涉及银行贷款本息6亿多元，银行仅受偿2300多万元，其余95%以上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灭失。

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特点，银行是国家的，与地方经济关系不如财政密切，银行权益受损再大，也不会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利益。因而，一些地方司法部门在审理破产案过程中，难免受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和观念影响，使企业达到逃废银行债权的目的。

本来贷款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今国有银行却不愿放贷，而将巨额信贷资金转向国债投资。国家让银行包销发行的巨额国库券，银行往往“包而不销”或“多包少销”，将大部分持为己有。原来国库券风险低而利率却与高风险的贷款相差不大，无险厚利且免税经营……令国有银行不寒而栗的是，一旦“复关”，国内不景企业将大批被淘汰，银行将陷于更加不利的危险境地。

外有外资银行竞争，内有国有企业沉重包袱，中国的银行业真正面临“内忧外患”。

经历了80年代以来眼花缭乱的扩张期后，国有银行终于进